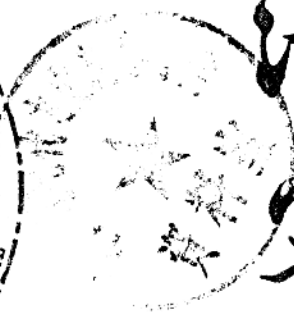


1104



海宁文史资料

第 四 期

政协海宁市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编者按：

在全国各地纪念抗日战争胜利 50 周年之际，我们收到了广西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刘泰隆先生寄来的一篇论文，题为：《爱国主义：宋云彬抗战杂文的总主题》。宋云彬（1898—1979）系我邑知名人士，文史学家。他 1924 年 8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在黄埔军校编辑《黄埔日报》。1925 年 12 月 15 日，参加在硃石东山召开的“国民党浙江省各县市党部联席会议”，参与声讨国民党右派召开的“西山会议”。蒋介石“四·一二”政变后遭通缉。1928 年冬起，任开明书店编辑，整理《辞通》，参加主编《中学生》杂志。抗日战争爆发后，曾回到家乡，在海宁县抗敌后援会负责宣传工作，主编《硃石商报》副刊《抗敌》，又帮助当地部分爱国青年走上革命道路。抗战期间，在郭沫若主持的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工作，从事抗日宣传活动。武汉沦陷后赴桂林，任中国文化供应社出版部主任，并任桂林师范学院教授。同时，与夏衍、秦似、孟超、聂绀弩等共同编辑文艺刊物《野草》，写过不少杂文，以后汇编为《骨鲠集》和《破戒集》。1945 年 6 月，参加中国民主同盟，主编《民主生活》。不久去香港，任香港文化供应站总编辑。1949 年春到北京参加新政协。建国后，任出版总署编审局处长和人民教育出版社副总编辑。1951 年，回浙江任省政协副主席、省人民政府委员、省文联主席等职。曾被选为全国第一届人大代表和一、三、四、五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和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为了更好地学习、研究宋云彬先生的爱国思想和学术成就，我们将刘教授的论文刊载于此，并以此作为对这位杰出乡贤的深切怀念。

爱国主义：宋云彬抗战杂文的总主题

广西师大 刘泰隆

八年抗战是中国人民爱国主义的伟大创举。桂林文化城是中国人民爱国主义高度发展的产物。没有来自全国和国际的广大文化人在桂林坚持开展广泛、深入而长期的抗战和反法西斯文化运动，就没有桂林这个抗战文化中心城市。爱国主义是桂林文化城团结抗战的旗帜，宋云彬的抗战杂文就是高举爱国主义旗帜的一个典型。

宋云彬，浙江海宁人，是与桂林文化城相始终的进步作家。抗战爆发不久，他便去武汉，在郭沫若领导的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从事抗战宣传工作。武汉沦陷后来到桂林，一直居住到1944年秋天桂林沦陷前夕。他旅居桂林时期，积极参加桂林抗日进步文化活动。他在二十年代和“左联”时期就写杂文，但只有到了抗战时期，他的杂文创作才进入成熟期甚至达到高峰。这时期，他出过的杂文集虽然只有《破戒草》（创作出版社，1940）和《骨鲠集》（文献出版社，1942）共计38篇；但是我们现在可以查到的已有70多篇，加上尚未发现的，估计其抗战时期杂文创作总数可能在90篇以上。

宋云彬是一位对语文特别是对历史很有研究、很有见解的学者，但在抗战时期却没有主要去撰述历史研究著作，而是写杂文。虽然在抗战前他已经知道写杂文“容易得罪人”，“立誓不再写”了^①；但是自从抗战爆发以后，他的杂文却越写越多，而成了鲁迅杂文战斗艺术传统的主要继承和发展者之一，桂林《野草》杂文作家群的中坚分子。这是什么原因呢，秦似认为是因为“有强烈的是非观”^②。此话是有事实根据的，宋云彬自己就说过：“抗战以来……偶尔得到某人变节或某

公消极等消息，总是愤恨与感慨交并，想写些短文来发泄一下，有时看到一些倒退与落后的现象，更是痛心切齿，觉得有许多话要说。因此……我便又破了戒，开始写所谓‘杂感文’了。”^③这的确是“强烈的是非感”；但是从国家民族观念来说，它是强烈的爱国心，高度的爱国主义——抨击某些人的“变节”和批评某些人的“消极”行为，自然是为了伸张爱国主义，坚持抗战；批判“倒退与落后的现象”，又何尝不是为了国家民族的进步和飞跃，跻身于世界的先进国家民族之林？纵观宋云彬抗战时期杂文的总主题，我认为就是爱国主义。宋云彬抗战杂文的爱国主义总主题，既表现于他这些杂文的丰富思想内容之中，也影响他这些杂文的思想艺术特征，并有其内在的各种原因。

一、宋云彬抗战杂文的思想主题

宋云彬抗战杂文的内容极其丰富：古今中外的现实和历史；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师生之道；“中国的脊梁”人物，民族的败类；什么是雅与俗，什么是美与丑；怎样读书；怎样做父亲，怎样对待朋友和敌人，怎样对待生与死；在诗歌作品中何谓诗趣诗美，在文艺批评问题上首先强调批评的重要还是批评的态度；等等等等。这些都在宋云彬的抗战杂文中展开了充分而深刻的论述。而从爱国主义思想主题来看，这些杂文大致表现了如下四个主要的子主题。

第一、反对侵略，坚持抗战。秦似很中肯地指出：“他（宋云彬）在抗战初期写的一系列杂文，几乎完全集中于一个主旨，那就是，中国人民要奋起抗战，要反对日本的侵略，反对世界法西斯。”^④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是极其凶残的，完全丧失了人性，但宋云彬杂文的主要锋芒不是这些，而是比中国历史上的任何异族侵略者更为残酷的本性，即“现在的日本是一个崭新的帝国主义的国家，他们不但要亡我国，

还要灭我种哩!”(《杂谈三则》)因此,他反复地告诫大家不要把现代的日本同过去的胡人满人相比,以为中国即使被征服了,他们将来也会被我们中国人同化;他痛切地指出:“现代的日本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帝国主义的国家,不是南北朝或五胡十六国时代的‘胡人’,也不是三百年前的‘倭寇’,而我们却已由文物之邦的‘上国’,沦为半殖民地的国家了。所以现在日本帝国主义者不但不怕被我们同化,它还准备做‘更生中国文化’的伟业哩。”(《从学鲜卑语讲起》)他要求做抗日宣传工作者注意提高“一般民众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它的军部法西斯的认识。”(《所谓“倭寇”》)宋云彬的这些论述似乎早已失去现实意义了,然而当我们最近读到香港《快报》今年7月10日的一篇新闻分析写道:台湾的一位要人,虽然自从抗战胜利五十年来,经常口吟“国父孙中山遗训”、“中国传统道德”,可是他小时候受过较纯粹的日本教育,思维的基础是日本式的,日本式的情感无形中潜移默化,根深蒂固,于是至今还有极深的“恋日情结”,我们便不由不惊心地想起宋云彬当年反复论述的日本帝国主义“要亡我国”、“灭我种”,“不但不怕被我们同化,它还准备做‘更生中国文化’的伟业哩”……是何等地深刻呵!宋云彬也正是从这种深刻的认识出发,他一再撰文高度赞颂坚持抗战慷慨牺牲的吴检斋先生(见《吴检斋先生成仁一周年》、《纪念吴检斋》),赞扬儒家的“生无所息”的人生态度,要求大家“活着一天,便该不息地为抗战而努力工作。万一不幸为抗战而牺牲了,也等于找到了一个长期休息的机会”(《从生死问题谈到人生态度》)。他反复地宣传“我们相信抗战必胜”(《杂谈两则》),“我们有胜利的把握,无失败的理由,是知其可为而为之。”“我们要根绝一切失败心理。”(《杂谈》)反法西斯的“同盟军的终会得到胜利,法西斯强盗之必然归

于失败，是谁都知道的，正如黑夜过去了必然还是白天一样”（《预言》）。历史证明了这些统统都是科学的预言，是鼓舞人民坚持抗战的强心剂，是夺取抗战最后胜利的探照灯。

第二、提倡民族气节，反对投降及其意识。宋云彬十分重视宣传国家民族意识，积极提倡民族气节。他认为，“就民族优良传统来说，那么，（气节）这一点是最可宝贵的”（《读书杂感》）。文天祥在《正气歌》里列举的许多历史上的气节之士，“都是中华民族脊梁，也是后人的模范，文天祥就以这些古人为模范，而成就他的志愿。”“无论在什么社会里，封建制度也好，资本主义也好，社会主义也好，气节总是应当宝贵，应当提倡的，尤其知识分子，更应该担负起这个责任来。”（《谈气节》）在这种正确思想指导之下，宋云彬褒扬了许多有民族意识、有民族气节的人，例如陶渊明、文天祥、史可法、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朱之瑜、傅山、李颙、孙奇逢、全谢山等等；对近现代有气节的学者，他特别赞扬了章太炎、吴承仕师生俩。为了弘扬民族意识，宋云彬还专门介绍了清代汪有典的《史外》，指出这是一本专写忠义气节之士的书，称赞汪有典及其父祖三代都以教授生徒为业，不仕异族统治者，“真值得后人景仰”。

在抗战杂文作家群中，宋云彬是对民族气节谈得最多的一位，同时也对汉奸及其意识作了最深入批判者之一。他对大汉奸汪精卫写了著名的《古今中外的汉奸典型》，深挖其叛国投敌的根源；对周作人的批判接二连三，先是指责他“把民族意识，国家观念都减退了。”（《从学鲜卑语讲起》）继而斥责他“以‘中国人’的资格而出席日本法西斯走狗所主持的什么‘更生中国文化座谈会’，那决非仅仅是失节，而是甘心做‘汉奸’了。”（《杂谈三则·三呵周》）到1940年12月周作

人出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常务委员、教育总署督办等职之后，宋云彬愤怒地批判道：“为异族臣仆，而沾沾然尚以倪元镇自况如周作人者，斯乃大辱，终身莫涤。”（《关于陶渊明》）真是史家笔法，义正辞严，掷地有声。

宋云彬几乎对一切有利于敌人的言论都展开了批判。例如在《没落了的策士》中揭露了主和派的政客们“极尽挑拨离间之能事，绝口不谈中国应与美英法苏等民主国家联合，而偏谈什么‘德意路线’俄德有联合之可能，张伯伦的‘现实外交’早定于十年以前等”。在《杂谈两则》中批判了“周作人把日本军部法西斯的狂暴侵略和我们的神圣的民族抗战，曲解为中日两民族的战斗”。在《读〈楮书〉》、《观桂戏〈桃花扇〉有感》和《杂抄三则》等杂文中批判了曾国藩、钱谦益、毛奇龄、侯方域、凌次仲等“于种族异同、主奴界限，蒙然无所觉，这也可以说是儒家湛心利禄所必至之流弊吧！”此外，还特别要提到《“日本人是徐福的子孙”辩妄》这篇杂文，宋云彬根据古籍《括地志》说：“亶洲在东海中，秦始皇使徐福将童男女入海求仙人，止在此洲，共数万家，至今洲上人有至会稽市易者。”和《汉书·地理志》：“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作出结论：“夫班固著《汉书》时，去秦始皇求神仙不过二百年，徐福带去的‘数千男女’，即使努力生产（案：生产作生育解），依照马尔塞斯的人口增加说来计算，也不会蕃殖到‘分为百余国’的，而况‘乐浪海中’或‘带方东南大海中’，都不是《括地志》所说的东海。”这是很科学的论断。依据这个论断，宋云彬批评有些人因此认为“日本也是我们汉族的子孙”，“我们现在不要说‘抗敌’，应该说‘讨逆’（谨案：逆者，忤逆也）”“是道地的‘阿Q哲学’”，“认敌人为儿子，这可不是玩的！”我认为这是极有见地的，在抗战时

期指明说：“日本人是徐福的子孙”乃是一种妄说，是反对模糊敌我界限的一面很重要的工作。

第三、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宋云彬坚决主张要敌我分明。他说：“敌友不分，要不得，认敌为友，更要不得。而误友为敌，那是莫大的损失。”（《“朋友毕竟是朋友”》）他坚决要求抗日统一战线团结一致，早在1938年9月就高度评价了章太炎在1936年北京学生运动中提出的“只要现在抗日就行，何必追究他一向属于何党何派”的主张，“要大家‘坦怀’相见，在抗日的的一个目标之下加紧团结，不要生新事，算旧帐。”（《章太炎与鲁迅》）他认为“凡是站在一条战线上的，即使过去不大相熟，或曾相识而分别已久，都应该互相尊敬，维护纯洁的友情。”（《朋友毕竟是朋友》）“对于一切动摇犹豫，而不敢公然为恶的分子，我们要设法去争取。”（《观桂戏〈桃花扇〉有感》）。甚至当周作人这个文化大汉奸只是出席了日伪主持的“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而尚未公开出任伪职时，宋云彬撰文批评也还立足于拉，认为“大概知堂老人舍不得离开他的第二家乡北平，同时不能——也许不甘——做什么地下工作，就只好跟敌人敷衍一下……‘会欲得当以报汉耳’。”——即一定会找机会来报效祖国吧！（《从学鲜卑语讲起》）宋云彬这么讲求团结是非常符合中国共产党的抗战主张的，因为团结就是力量，团结的人越多力量就越大。

宋云彬强调坚持全国抗日战线的团结和国际反法西斯战线的团结，同时也反对国内抗日战线的分裂和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分裂。他批判“政客们”“不承认现在国际间有侵略与和平两大阵线”（《没落了的策士》）。他旗帜鲜明地反对国际上的“反共”口号，愤怒地指斥“有谁借用这（“反共”）幌子来‘内欺国民’的，便是违反抗战国

策，背叛国家民族的汉奸！”（《扯下他们的幌子》）他坚决反击日本帝国主义分子对反法西斯阵线的挑拨离间，例如在《杂谈两则·二美和丑》中就义愤填膺地斥责：“说到俄国（那定指苏联吧），它压根儿不是侵略国，我们用不着跟它‘对抗’，英国是我们的友邦，也没有跟它对抗之理。武者小路实笃，请少说些废话吧！无聊的梦呓，不能起什么挑拨作用的。”宋云彬写这段话的时候，苏德战争和太平洋战争都尚未发生，但关于苏英是我国抗日和反法西斯战争的友邦的论断完全为后来的历史的发展所证实。

第四、坚持进步，反对复古倒退。爱国主义者对自己的国家民族不但不容别人侵犯，而且衷心希望并努力促其进步，不让它倒退。宋云彬的杂文在这方面也作出了很多贡献，首先他提倡民主政治、提倡学术自由讨论、提倡道德要随时代进步、提倡研究进步作家、提倡文艺批评等等，在《继承蔡先生的精神》、《谈读书》、《杂抄两则》、《杂谈两则》等杂文中都可以看到。其次，他反对专制，反对守旧、复古、倒退，反对实行对学术思想的统制，反对政府、学校把学生读进步书籍视为“思想问题”，反对盲目崇拜古代文化，反对作家互相标榜等等，在《辛亥革命与袁世凯》、《文化界值得注意的一种倾向》、《杂谈》、《我爱孔子》、《谈做父亲》、《辞“作家”》等杂文中都有充分论述。总之凡是有利社会前进的他都提倡，不利社会发展的他都反对，他谈得都很新颖，很使读者受到启迪。我现在另举一篇杂文《畔牢愁》为例。宋云彬说畔牢愁就是“反牢骚”，“善发牢骚的人往往是最没出息的人（自然，象屈原那样的牢骚，是又当别论的）。”“斗争（不论理论或行动）已到了最尖锐的阶段，我们如果还分不清敌和我，辨不清是和非，不懂得爱和憎，模模糊糊，只管发个人的牢骚，那不必等到‘恨恨而死’，早就

被时代所遗弃了。”宋云彬反牢骚的观点前与鲁迅的《恨恨而死》的杂文、后与毛泽东的名句“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精神是相通的，启发我们有牢骚时，首先必须正确检查自己的思想，是否陷入了个人主义的圈子，即使是对现实感到不满不平也必须去寻找其导致的社会原因求得正确解决的途径，否则只会发牢骚，于个人的身心健康有害，于社会和国家民族的进步也只是有害而无益处。这是正确地观察事物和处理社会矛盾的一个思想方法问题，也是正确对待自己、正确对待群众和坚持推动社会进步的一条重要原则。

二、宋云彬抗战杂文的思想艺术特征

宋云彬是一位对语文很有研究的学者，单就对文学体式的研究水平来说，他就可以被称为文体学家。在《介绍一首散文诗》中，他能很准确地判断报告文学体裁与散文诗体裁的区别；在《故事新编》的研究史上他是科学地把《理水》、《采薇》、《出关》、《非攻》定为历史小说，而把《补天》、《奔月》、《铸剑》、《起死》说为神话传说或寓言，不能称为历史小说”（《从历史小说谈到〈历史小品选〉》）的第一人。他评章太炎鲁迅的文章都“廉利劲悍，辞无枝叶，而用辞精确，善于刻划，起止自在”（《章太炎与鲁迅》）；希望《野草》“多登载些锋利深刻而充满热情和善意的讽刺文章。”（《无题》）这些都可以看作是他对于自己杂文风格的追求。同时，他认为“做文章第一要有内容”，新旧八股都要反对。（《杂抄两则》）这也可以想见，宋云彬抗战杂文的爱国主义的总主题必须要求有相适应的艺术形式为之服务。通过研读，我认为他的杂文在其爱国主义总主题和上述文体修养及文体理论主张影响之下，形成了如下一些思想艺术特征。

（一）富有知识性和学术性以至历史真理和人生哲理。《奴隶篇》

就是一篇奴隶思想发展简史，三个部分概述了古代、近代、现代三个时代中国奴隶思想发展概况，也概括出了三个时代的历史真理。例如第一部分结尾说：“‘奴隶’这个名词，虽然字面上看来不大冠冕，然而只要生活过得下去，尤其是在奴隶阶层里爬得高一点，永远不会感到耻辱、不平而意图挣脱的。”曾国藩不就是奴隶阶层里爬得高而不意图挣脱的一个吗？如果他意图挣脱奴隶地位自为主人取爱新觉罗而代之，以其兄弟子侄之聪明才智不比慈禧有利于国家民族数十倍么？第二部分文章指出，到了近代，“我们身上的镣铐不止一副，挣脱了满洲人所给我们戴的那一副，却还有帝国主义者给我们戴的。”这写的是铁的历史事实。第三部分结尾说：“要创造中国历史的第三样时代，须要根本拔去奴隶思想。否则无论是留学生也好，名教授也好……一旦褫其华衮，露其本相，也不过是奴隶罢了。”这是一百多年来反复被证明了的历史真理。另外，像《杂谈三则·一检陶》就是一篇按鲁迅说的“用别一种看法”理出的研究陶潜的简史，《谈气节》就是一篇从先秦到民国的士大夫气节的变迁史，其中不同程度地都概括有关历史真理和人生哲理。

宋云彬抗战杂文为什么会具有这种思想艺术特征。我认为，首先就是由于表现爱国主义总主题的需要，就是由于中国历史上“抵抗异族侵略而建立丰功伟绩的人，也并不算少”，但许多人健忘，甚至忠奸莫辨，“好像曾国藩真是民族英雄，足与文天祥史可法并垂千古似的。”（《杂谈》）因而宋云彬意图通过写杂文普及有关历史知识、历史真理等等，用以激励国人奋起抗战，保卫祖国。其次，宋云彬深切地了解杂文与一般论说文最重要的区别：杂文的论点一般表现为某种哲理，论据尽可能形象化，论证也往往采用形象性的表达方式。他借助

讲述历史故事、历史文献作为论据，展开论证；这样就容易使杂文获得形象性、生动性、趣味性，使理论形象化、理论情趣化和论从史出，从而艺术上表现理、形、趣的统一，使读者感到愉悦和信服。这是宋云彬抗战杂文在思想艺术上获得巨大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感情炽热，寓热于冷，外冷内热。宋云彬在《〈破戒草〉序》里说过：他写抗战杂文是出于“偶尔得到某人变节或某公消极等消息，总是愤恨与感慨交并，……看到一些倒退与落后的形象，更是痛心切齿。”从“愤恨与感慨交并”和“痛心切齿”这几个字中，可以想见他的感情实在达到了白热化的地步。但是他知道锻造高效能的利剑既要有炼钢炉的高热，也需要最后通过冷处理；最善于说理者不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而是平心静气地摆事实、讲道理，循循善诱，以理服人。所以他写杂文采用寓热于冷的表现方式，或将自己的观点从分析一系列历史事实之后得出（如《谈读书》一文指出“从前那种钦定的读书办法是要不得的，最好的方法，是让人家自由研究”）；或把自己的观点融在客观史料的辨析和考证之中，自己尽量少发或不发表意见（例如《杂谈·六》借谈从汉到宋学生做出爱国行动素来受史家称赞，讽刺当时国民党教育部搞所谓“整顿学风”之不当，他并无半句直接指斥国民党教育部的话，但讽刺之意深寓其中）。宋云彬是有幽默和讽刺以至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才能的，《我们的狗之死》和《策士的簧鼓》两文便是例证。前文共三段，第一段写得极其幽默生动，宋云彬笔下的中国狗几乎可以同鲁迅笔下的叭儿狗相比美，第二段则极尽蔑视讽刺之能事，结尾一段这样写道：“‘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不，我说错了，应该说‘庸狗自扰之’。我们的‘庸狗’，你好好儿安息吧！祝福你的灵魂的安适！”这是既讽刺又幽默。后文是为批判想把那次伟

大的反法西斯反侵略战争,解释做你争我夺、毫无意义的战争,一面又替纳粹开脱的政客们写的,为节省篇幅,这里只摘引其几句:“他不说‘汉初无为之治’,而说‘汉朝无为之治’,证明了他没有历史常识。因为所谓‘无为之治’也只有文帝一朝,……七国之乱平定后,景帝已偏重名法,到武帝索性罢斥百家,独尊儒术了。这一段历史故事,只要读过‘初中历史教科书’就会知道,然而写文章向‘旧金山会议献议’的何永佶却不知道!”这里开头是带嘲笑性的讥刺,后面却发展到怒骂了,但却是妙文。然而宋云彬在抗战杂文中未多施展这方面的才能,因为他写杂文批评的对象少数是汉奸、特务和法西斯走狗,多数是爱国统一战线内部的朋友(包括上面提到的国民党教育部),不能不管“什么对象,总是尖锐的讽刺一番,结果是……杂文几乎要从战斗的阜利通变成妨碍联合战线的绊脚石了。”(《略谈写杂文》)这几句话虽然是抗战胜利后说的,但也代表他在抗战时期的写作主张,所以他提倡“充满热情和善意的讽刺”。讽刺要热情和善意是一种冷处理吧!宋云彬杂文的寓热于冷、外冷内热也表现于常常笔底藏锋,有意留给读者想象余地。《谈做父亲》一文把对儿子读书的学校当局将学生读进步书刊视为“思想问题”的批评,曲折地化作自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父亲”的“忏悔录”写出来,对那些学校当局不作半句正面批评,对学校以外的社会各界也存在这种法西斯思想统制问题,只淡淡点到为止,真可以看作宋云彬杂文寓热于冷、笔底藏锋的代表作品。《章太炎与鲁迅》一文高度评价了章太炎“一贯的民族主义”,“两年前主张联合各党各派以抵抗日本的侵略”;鲁迅自执笔替《新青年》写文章,“一直到临死前几小时还没有丢掉他的‘投枪’。”结尾却只说他俩逝世两周年都已到或快到了,而他俩的故居和遗墓都已经落入沦陷

区了，“我们今天怀念这两位民族革命的战士，比去年要更增一层感慨吧？”至于应当以如何的行动去纪念却半句话也没说，留给读者去思考，真是此时无声胜有声！《辛亥革命与袁世凯》一文，作者的意图则完全留给读者自己去想象。

（三）朴实平易，深入浅出，起止自在。真理是最朴素的，宋云彬的抗战杂文为了使其爱国主义的总题旨为尽可能多的读者所理解和掌握，他追求朴实的文风，论点措词稳当平妥；语言主要运用普通话的口语，适当掺用一些仍有生命力的文言词汇，表现出以白为主、文白杂糅的特点；文字浅显，平实易懂。论证的论点和得出的结论都具有一定的哲理性，给读者的印象便不是文章意思浅露或浅薄，而是厚积薄发、深入浅出。宋云彬的文章谨饬，章法、句法和用字都很讲究。例如《杂谈三则》的三则文章，第一则为第二则铺垫，第一、二则又都为第三则铺垫；“芦沟桥的炮声，惊醒了一切醉生梦死的中国人，然而我们的‘苦雨斋主’，却从容不迫地在他的‘寒斋’里吃‘苦茶’！邻居的无线电收音机，可以使他为了俗曲俚歌的刺耳而失眠，‘皇军’的飞机大炮声，却可以使他安闲地聆赏。”这些句子修饰得何等工整灵巧，每一个词汇和每个标点使用得何等精确，把周作人在日本侵略者炮火声中的异常心理又是刻划得何等具体而入微。宋云彬的杂文一般都是围绕一个中心问题，直线发展，开篇不久即切入论题，随后立即展开论证，论证结束文章便告结束，不枝不蔓、起笔自然、结束得也自然。用宋云彬概括出来的章太炎、鲁迅师生俩的共同文章风格来对照宋云彬自己的杂文风格，除了“廉利劲悍”宋云彬虽然衷心称赞，但因章太炎、鲁迅的杂文大部分是对付敌人的，而宋云彬的杂文主要是对抗战统一战线内部朋友的，便没有取法之外，其余“辞无枝叶，而用辞

精确，善于刻划，起止自在”，可以说都师承了的。宋云彬是文章的里手。有人认为宋云彬杂文只是平易自然没有什么技巧，实在是一种误解。宋代大文学家王安石说得好：“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清代诗评家冒春荣在《葑原诗话》中也说得很透彻：“自然为上，工巧次之；工巧之至，始入自然；自然之妙，无须工巧。”所以，平易自然就是很高的技巧。

三、宋云彬抗战杂文思想主题和思想艺术特点的成因

木有根，水有源。宋云彬抗战杂文的爱国主义总主题和思想艺术特点产生的社会原因，是时代的需要，社会的需要，无需多加论述，以下拟对作者自身的原因提出几点看法：

宋云彬是有真知灼见的历史学者。他对中国历史进行过深入研究，二十年代就为商务印书馆选注《资治通鉴》。当“有人替印度人悲哀，说他们没有一部象样的历史书”的时候，他感慨系之指出：“中国的历史书，真是汗牛充栋，但有些中国人似乎太缺乏历史观念了。这也是可以悲哀的。”（《杂感·二》）因此他写杂文发挥其于历史研究之长，或取材于历史故事、文献，或引用史料直接批评现实时，都特别重视宣传爱国主义的历史观念，对尚气节“严夏夷之辨”的“中国民族的脊梁”人物褒扬之，对“被威武所屈、富贵所淫”的失节人物，就连杜甫赞许过的“暮年诗赋动江关”的庾信，也逃不过他的贬责。宋云彬还批判了不利于弘扬爱国主义的儒家教条以及“人皆曰可杀，我意独怜才”等“重视小节而忽略大处”的历史糟粕；并总结出做人的准则和人生真谛。例如“为异族臣仆……斯乃大辱，终身莫涤”。“慷慨牺牲的烈士比保持名节的义士更可贵。”“在这个（抗战）时代里，‘死’真算不得一回事。那些为国家民族而慷慨捐生的将士们，是死无遗憾的；那些

参加抗战工作的青年以及文化工作者，受了不及防或不可抗的侵袭时牺牲了生命，也是死无遗憾的；然而还有不死于敌人之手，而出乎意外地牺牲了宝贵生命者，这才真是死犹有憾。”（《忆叔琴》）等等。宋云彬的不少杂文也写得很有学术创见，例如《关于陶渊明》一文末尾提出陶渊明特别痛恨刘裕的原因，“不仅因为他是晋朝的乱臣贼子，同时因为他宁使北方长被异族占领，只图窃取帝位，偏安江左，以小朝廷自娱。”论据可靠，论证有力，是对陶渊明研究的一个大贡献，更是以学术研究弘扬我国爱国主义优良传统的佳例。读到这样的好杂文，联想今天台湾、西藏的某些人妄图搞所谓“独立”，想使台湾、西藏从祖国永远分裂出去成为帝国主义的附庸，我们海内外所有炎黄子孙对之应当更比陶渊明痛恨刘裕几千倍！

宋云彬是鲁迅思想精神的继承者。他自“五·四”以后就爱读鲁迅杂文，他写杂文受人的憎恨但还是写，原因之一就是“相信鲁迅的话：‘说话说到有人厌恶，比起毫无动静来，还是一种幸福。’”（《我怎样写起杂文来的》）宋云彬杂文对陶渊明、章太炎的评价是以鲁迅的观点为准绳的，《谈做父亲》、《奴隶篇》以鲁迅的《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灯下漫笔》为指导思想；《畔牢愁》流动着鲁迅的《恨恨而死》的血液；《预言》是对鲁迅关于要多读外国书的意见的最好诠释，……总之，宋云彬杂文几乎每一篇都可以寻找出继承和发挥鲁迅思想的印记。宋云彬对鲁迅精神更加积极提倡学习和努力实践，对鲁迅的战斗精神“特别提出来”的两点，“第一是有韧性，第二是不宽恕敌人。”（《鲁迅的战斗精神及其战略》）在对周作人的批判上充分表现出来，前面列举过“再三批判”，其实何止是“再三”，在《杂抄三则》的末尾又批判他“公然在北平做了五个年头的汉奸了”。1947年在《和平楼谈屑

·章太炎二三事》中，称章太炎“是一代通儒，是狭义的民族革命者，是始终主张团结御侮者”之后指出：“而周作人则关在南京老虎桥的监狱里，顶着汉奸头衔受罪。”宋云彬对周作人的批判持久不懈，不是私仇，不是个人偏见，而完全出于国家民族大义。唐弢在《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的道路》中说，鲁迅的伟大的爱国主义和追求民族进步与解放的思想贯穿着他的全部作品和全生命。我们从宋云彬杂文中可以清楚看到，宋云彬是鲁迅思想精神特别是爱国主义思想精神的杰出继承者之一。

宋云彬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积极拥护者。宋云彬杂文没有讲马克思主义理论，但却充满辩证法和唯物主义思想。例如说“古”的东西有“不少宝贵的遗产”，也有“许多无用的剩渣残渣”，“今”的“资本主义文化已开始腐烂，但足以代表资本主义新兴时代的”有些东西，还是值得学习（《文化界值得注意的一种倾向》）。对周作人的汉奸言行，是愤怒呵斥的，然而却不否定他的文艺修养在我国现代作家中“为第一流”（《杂谈三则》）。在《回忆泰戈尔》一文中特意宣传尼赫鲁的重要言论：“对于我，社会主义不仅是我所赞成的一种经济原则，它并且是我以全力拥护的一个重要信条。”这些都表现了宋云彬坚持辩证法、坚持唯物主义和拥护社会主义的进步思想。与此同时，他对中国共产党表现了坚决维护的立场，在《从“不断革命论”到“各党各派取消论”》中，揭露了国民党中有人“藉公开信劝共产党抛弃其组织与宣传”的罪恶企图；在《杀人方法种种》中又借谈中国古代多种多样的杀人方法，揭露国民党的《民意》杂志还在煽动“活埋”所谓“乱党反动分子”（实指以中国共产党人为代表的革命分子）的罪行。在《杂谈两则》中用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统一的观点诠释“爱国心”，指